

“汉字革命”

Hanzi Geming

中国现代文化与
文学的起源语境

赵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字革命”

Hanzi Geming

中国现代文化与
文学的起源语境

赵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革命”——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起源语境 /
赵黎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04 - 9023 - 4

I. ①汉… II. ①赵… III. ①汉字 - 汉语史 - 研究 -
现代②现代文学 - 文学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H12②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719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於可训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总喜欢谈论启蒙之类的大话题，或从外部冲激入手，谈西方影响，这都没错。但问题是，这样的大话题既容易忽略历史的细节，又容易脱离具体的语境，所以有些问题就难以说得清楚。比如谈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光讲启蒙思潮和西方影响还不够，还得注意一个历史的细节，即胡适等海外留学生关于汉字问题的一场争论，是这场争论引出了文字的“死”、“活”与文学的“死”、“活”问题，又引出了胡适与陈独秀的几通书信，进而有胡适的白话诗试验，有“文学改良”的主张出现，有“文学革命”的大旗高擎。而文字问题，或如本书作者赵黎明博士所说的语文问题，又是清末民初具有民族、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一个与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有关的问题，加上近代教育改良，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胡适等海外留学生讨论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问题，如果再算上社会民众的需求，文字问题或曰语文问题，就成了这期间社会变革、文化更新包括文学改良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最终还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对这些中国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启蒙和影响之类的大话题，是无法落到实处的。这些大话题落不到实处，也就不能有效地回答五四文学革命何以在此时发生而不是在彼时发生，何以是由此一人群发动而不是由彼一人群发动，何以是由此一（或几人）领袖而不是由彼一人（或几人）领袖，等等。这些问题

回答不好，文学史研究就难免大而化之。我当初欣赏赵黎明的博士论文选题，所看重的正是他对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着眼于近现代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从最切近的问题入手，逐步进入民族、民主或曰救亡、启蒙，包括西方影响之类的宏大问题。这样的研究同时也易于实证，避免凿空之论，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从前研究五四文学革命的人，总要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主张文学形式的改良，是形式主义的文学改良观，只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才是主张文学内容的革命，才符合五四新文化的要求，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且不说革命和改良，在那个时代的词义并无本质的区别，就算是有程度的不同和轻重之别，讲文学形式的革命，未必就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试想，如果没有晚清以降，及于民初的语文革命，和对白话文的提倡，包括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国的文人学子，还操着之乎者也的文言，又怎么能去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倡导科学、民主的新型文化呢。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译介西方的思想文化，难以找到对应的概念术语和表达方式，也不仅仅是因为艰涩的文言，难以为需要启蒙的大众所接受，更重要的是因为，一种形态的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形态的思想文化的载体，是表达、传播和接受的工具，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完成了的思想文化形态。英美新批评派的批评家说，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其是之谓欤？既然如此，对旧的语文工具进行一场革命，岂不就是文学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岂不就是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何须另外还要在是形式的革命还是内容的革命的问题上去区分高下呢。以此类推，赵黎明所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文运动”，都不只是一个工具和形式的问题，而是同时也在创造一种适应那个时代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所以百年语文运动，就不只是在民族、民主两大潮流的推动下，或同时也在

推动民族、民主两大潮流，而是同时也是民族、民主两大潮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民主这两大思想文化潮流的一种完成形态，或正在完成中的形态。不知我的这些浅薄的意见，是否能为赵黎明的论文，提供一点理念上的支持。

赵黎明是从已故龙泉明教授门下转入我门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他以前治古文献，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功底，有很强的处理文献资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养成了一种扎实求证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基本上做到了荀子所说的“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不容易。黎明能达此境界，甚慰我心。他的论文立意的深新和论析的透辟，因此也就不是虚张声势，而是靠语语坐实。黎明在读期间一直为身体所困扰，但他克服了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篇分量厚重的论文的写作，答辩时颇得好评。现在经过打磨，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放在书前作个装饰和点缀。我遵嘱写了这几句话，也算是他在我门下问学的一点纪念。

2008年元月9日

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序 二

朱栋霖

两年前的赵黎明来苏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在可训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研究“现代民族文化语境中的语文变革运动（1840—1949）”，题目颇大气——《中国语文的新生》。他将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从晚清以来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变化来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就黎明的这篇论文看，他的研究势头很好，他的博士后研究应该接着这个思路做下去，研究当代汉语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就我当初所读到的黎明的博士论文看，他的研究历史与文化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感觉敏锐，以特有的激情与冲动明快地抓住研究对象的关键要害，判断深刻，语言明晰透彻。他的研究长处很多，那篇博士论文做得很有气势。他未来的发展需要在某些方面做深入些的挖掘。我不主张他把战线拉得过长，一下子研究一百年的汉语沿革，这样可能导致研究的散而浅。在几经探讨后，觉得集中研究当代语言变革的几个问题，深入探讨，将语言与文学关系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黎明的20世纪中国语文变革研究很有意义。尤其是他全面展开了对现代汉语演变轨迹的探讨，以此为切入口研究文学，这样的研究思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是引人注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成熟、人员队伍庞大的学术领域。三十年的研究队伍集中了五六千人的研究与教学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基本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成果的主体，尽管后来不断有新的成果充实进来，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表述的框架已基本不变。在中国这

个人口众多的、特别强调统一的国度，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大兵团作战，大多数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一样好跟随潮流。80年代大家都研究鲁郭茅巴老曹，还有就是郁达夫、沈从文、丁玲等，现在是无休无止的钱锺书、张爱玲、新感觉派、现代派研究。尽管文学研究新方法曾引起过轰动，或者制造出一点争论的话题，但都很快归于原地。新方法尽管提供了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对一些文学现象可以有一些花样翻新的表述，但是如果不深入文学本体、不发掘新的资料，对文学研究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最令我不安的是，看到每年有大量的研究生论文在做过去已经做过的研究，在大同小异的题目下不断地重复做着大同小异的研究。人文学科是思考的学科，文学是需要感悟的。没有思考与感悟，文学研究如何创新？

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中国高校学科内部分工过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现在还有比较文学，学科之间互相不了解，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更是两大鸿沟。中国的现代人文科学学者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他们了解西方现在的潮流甚于了解中国文化自身，这种情况在年轻一代学者那里越来越严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通向古代文学，怎么掌握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正是这种知识与文化的隔膜，使现代文学研究界至今误认为五四新文学乃是从天而降，或者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其实从明代中叶以来，中国正统的社会思想文化内部已经产生了一股反叛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反理尊情、推崇个性、解放人性的思想探索与表现代有其人，直至晚清。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正是对此前三百年中国近世叛逆思想潮流的阐扬与提升。

赵黎明论文的可贵之处，是打破了现代文学与语言研究的隔膜。在他之前当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研究。赵黎明的论文对百年来语文运动的变化及其内外原因进行梳理探讨。他看到了每次的文

学（或者文化）革命，都无一例外地从文字革命开始，进而蔓延到语言革命，并最终掀起文学（文化）革命的风暴。晚清切音字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五四汉字革命与国语运动、三十年代拉丁化运动与大众语运动，都是如此。他的论文，从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文化）革命大潮紧密相连的现象入手，深入思考其中深层原因。

他在论文中敏锐地提出，“民族”和“民主”是百年中国语文变革的双重引擎。一百多年的语文变革与民族国家意识演变相呼应，语言文字变革伴随语文家的“中国”想象。与此相关，“民主”的诉求也与语文革命相始终。因此现代民族和民主意识成为语文革命的内在动力和潜在主题。他以大量篇幅来梳理百年来语言文字革命的思潮，用意在于把历史人物的主观意愿调查清楚。他建构了三个层次的观察点，从文字变革层面、语言运动层面和语言文学实践层面来对语言本身的物质性变化进行描述，来讨论百年中语文学家诸多理性设想的意义与成效。

赵黎明在苏州大学的博士后研究还在进行。我相信他有更出色的成果问世。

苏州读万卷堂

2008年4月12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语文变革运动	(6)
第一节 清末文改运动的世俗化趋向与古代文化的 现代转型	(6)
一、突破汉字神圣光环, 确认汉字世俗价值	(6)
二、以“器用”眼光重新审视汉字本质特征以及功能 ...	(9)
三、文字变革与民族文化现代转型	(12)
第二节 清末语言变革的文化道路(之一)	(14)
一、“语言文字亡则种性失”	(14)
二、明“古韵”、去“夷音”、扬“夏声”	(19)
三、“万殊”与“齐一”	(26)
第三节 语文变革的文化道路(之二)	(29)
一、“万国新语”, “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	(30)
二、“非科学时代之文字”与“科学世界之思想 与事物”	(33)
三、“以进化淘汰之例, 惟良者存, 故支那文字 应革命”	(37)
第四节 多元冲击与文言文的危机	(42)
一、白话报: “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无聊”	(44)
二、新文体: “距完全用白话也只一步之差”	(47)
三、通俗小说与“新式国语化”白话	(50)
四、晚清翻译文与桐城“义法”的崩坏	(54)

第二章 五四前后的语文变革运动	(59)
第一节 “汉字革命”理论及其激进主义文化策略	(59)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59)
二、“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 国粹的好”	(63)
三、“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激进文化策略	(69)
第二节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	(83)
一、“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83)
二、“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	(86)
三、“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 文学观念’”	(90)
第三节 歌谣方言研究与“文学国语”的民族性诉求	(98)
一、“在这些歌谣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 也许能产生出来”	(98)
二、“他能暗中摸索，去寻求中国语言的‘心’”	(101)
三、方言文学：“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	(107)
第四节 “实验的精神”与“文学的国语”建设	(111)
一、“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 ..	(111)
二、“要国语革命，惟有努力从事于新文学的创作” ..	(113)
三、“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要用 全力去试做白话诗”	(118)
四、“提倡国语的文学，把白话作为求高等文化、 高等知识的媒介”	(119)
五、“文学是用国语写的，国语是写文学的语言”	(121)
第三章 30年代的语文变革运动	(126)
第一节 “为汉字而牺牲我们呢，还是为我们而 牺牲汉字？”	(126)

一、“大众语的建立，如果不和拉丁化问题 联系着提出，是永远得不到结果的”	(126)
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29)
三、“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132)
四、拉丁化的传入与在国内的产生与发展	(137)
第二节 “大众语”：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祛除	(138)
一、对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反思	(138)
二、大众语被赋予的草根属性	(141)
三、“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话中那接近大众语的 一切”	(144)
四、“把土语方言演成文字，就可以成为大众 语文了吗？”	(146)
第三节 “我们是谁”	(149)
一、“‘第三等人’反封建虎头蛇尾，大众语建设 还能依靠这个阶级吗？”	(149)
二、“文化革命的任务，只有劳苦大众自己 才能完成”	(153)
三、“大众其实有‘理想大众’和‘现实大众’ 的区别”	(159)
第四节 五四批判与“文腔革命”	(162)
一、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批判	(162)
二、“文腔革命”	(168)
三、欧化问题	(174)
第四章 40年代的语文变革运动	(178)
第一节 “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的试炼	(178)
第二节 民间语言、人民本位与知识分子的接受焦虑 ..	(185)
一、“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真正的中心源泉”	(185)

二、“亭子式语言”与“大众口头语”	(188)
三、“旧瓶”与“新酒”；“新形式”与“旧形式” ...	(192)
四、“欧化”与“民族化”	(196)
第三节 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	(203)
一、“语言”与“现实主义”	(203)
二、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	(206)
三、语言与民族形式：能否反映“活的民族现实” ...	(208)
四、民间形式（语言）：“封建意识体化在生 活样相里面”	(210)
第四节 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民族解放洪流中的 文学迁移	(216)
第五章 “汉字革命”的外部动力与内在张力	(226)
第一节 “汉字革命”与“中国”想象	(226)
一、晚清到五四：语文运动与多样的“中国”	(226)
二、20世纪20年代：语文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 意识	(231)
三、30—40年代：语文运动与民族解放	(236)
第二节 “汉字革命”与“德莫克拉西”	(240)
一、清末民初：汉字改革与大众启蒙	(240)
二、五四时期：汉字改革与“平民主义”	(243)
三、30年代：拉丁化与普罗运动	(249)
四、40年代：新文字运动与“人民”的崛起	(255)
第三节 现代民族共同语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 ...	(261)
一、清末到五四：“方言”的发现与“国语”的 构建	(261)
二、30年代：“方音”与“普通话”的紧张与 对话	(267)
三、抗战到建国：方言文艺及其“全国性”转化	(271)

四、新中国成立：普通话的推广	(274)
第四节 欧化·现代化·民族化	(278)
一、清末民初：“欧、和”语言与中国语文的 “化合”	(278)
二、五四时期：“欧化”就是“世界化”、 “现代化”	(282)
三、30年代：欧化的资产阶级化与无产阶级化 之争	(290)
四、40年代：“民族形式”与“欧化”的紧张	(292)
结语：“汉字革命”与现代文学的整体性	(296)
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05)

绪 论

作为一句完整的口号，“汉字革命”一语可能最先来自五四时期的钱玄同^①，但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则可上溯到晚清甚至更早。近代持续不断的汉字改革如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废除汉字运动、“世界语”运动等等，都属于“汉字革命”的范畴。为什么要从语言文字改革入手考察文学革命？这不是笔者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实在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如此。考诸百年语言文字变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次的文学（或者文化）革命，都无一例外地从文字革命开始，进而蔓延到语言革命，并最终掀起文学（文化）革命的风暴。晚清切音字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五四汉字革命与国语运动、30年代拉丁化运动与大众语运动，无一能逃脱这一铁律。在这些特定时期，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文化）革命大潮紧密相连的现象，促使我们对其深层原因进行进一步思考。

仅仅语言文字革命就能掀起文学（文化）的波澜吗？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回到历史现场，人们发现在近代中国，纯粹的语言文学问题，常常不是语言文学本身问题所能决定得了的。那么，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风云际会对语言文字变革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是哪些因素在促进着这些变革呢？

鸦片战争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历次改良或革命的目的不外一个：就是如何启民于愚昧，救国于倒悬，就是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在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创建民族文化是他们对

^①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卷7期“汉字改革号”，1922年。

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如果把现代民族文化构建比作一场大合唱，那么语言文字变革就是大合唱中最基础的音部；如果把现代民族文化建设比作一列奔驰的列车，那么语言文字变革就是它的底座与轨道。某种程度上，“汉字革命”成了现代文化/文学的起源语境。

何以如此？从“外部”动因来说，百年来（1840—1949）中国语言文字革命是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进行的，民族主义是这种合力的构成要件。当然，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东方型的民族主义，按照费正清先生所说的“冲击—反应”模式论，它是对列强凌压的回应与反弹。这种反应并不是消极无为的条件反射，而是积极的回应。简单地说，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外求独立，内求民主，它是“一民族为他民族所压迫，而该民族本良心之自觉，不甘于压迫时所起之一种离心运动”^①。在这个被“蹂躏、征服、鲸吞”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既充满反抗与斗争，也满怀对现代国家的憧憬与“想象”——尽管想象中的效法对象是那曾给自己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施暴者。“民主”从来就是和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民族国家思想涉及国民思想，民族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②张灏把民主与民族主义视为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汉字革命”的内、外两重角度考察对象了。从“汉字革命”的目标来看，主要是解决大众的识字和普及教育问题，从而使之成为振兴民族的中坚力量；从其特殊目标来看，是要建立民族共同语，这是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必须面临的课题。立于民主立场，必须解决言文不一、手口分离的矛盾，解

① 潘迺：《今后中国教育宗旨应含国家主义的精神》，《中华教育界》1926年15卷8期。

②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决语言文字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问题，语言革命的彻底性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而这个“底”的底线就是接近那目不识丁的大众的无限近似值；立于民族立场，就要着手解决现代民族国家所必要的语言统一问题。因此，“民族”和“民主”成了百年中国汉字变革的双重引擎，因而自然成为现代/文化文学的起源语境。当然，民族与民主只是“多维”文化力量之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强调它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否认现代文化/文学运动在多种文化“合力”作用下完成的基本事实。

从“内部”节奏来看，百年“汉字革命”可分为三个高潮，即清末民初、五四前后以及三四十年代。这三次高潮就是三次语文自我否定运动。首先，从文字革命的对象看，三次运动所提倡的替代文字虽然各不相同，但革除的对象无一例外的都是汉字，所列举的革命理由也几乎雷同；其次，从语言革命的角度观察，三次革命的对象除了古文之外，后一次的革命却总在对前一次的否定基础上进行的。再次，三次语言文字革命最后总要波及文学实践，只有文学实践才能把前两种革命的任务落到实处。

基于此，在考察语文运动时，我建立了三个层次的观察点，即文字变革层面、语言运动层面和语言文学实践层面。当然，根据对象问题的多少和堆积的厚薄，处理的方法和强度也有所不同。在本书中，我花费大量篇幅来梳理百年来语言文字革命的思潮，用意在于把历史人物的主观意愿调查清楚；而对语言本身的物质性变化的相关考察，显然是想证实这些设想的客观效果。只有通过逻辑与历史一定程度一致性的考察，才能验证这些语文运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百多年来的语言文字变革，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运动相纠结，与启蒙主义思潮相推涌，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再则，纷繁复杂的语文运动在历史的河床里流淌，波浪相逐，很难划出截然的界限，这给我们的研究也带来了难题。既要对百年来的语文